

周期视角下的奥巴马外交政策： 内敛还是外向？

刘建华

摘 要 按照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自 1776 年美国立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不断摇摆,呈现出“内敛”与“外向”钟摆或周期性演变规律。根据这一理论,奥巴马上台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美国外交史上第五周期的外向期末段,未来一段时期将面临较大的内敛压力。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对外扩张动力不足、海外撤军时注重霸权威望、要求盟友和伙伴分担更多责任、强调选择性灵活介入、在与主要竞争对手合作的同时加强“软遏制”等特征。

关键词 美国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周期 奥巴马政府

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起初处处展现出合作、谦恭的姿态。但仅仅过了一年,美国就在朝鲜半岛、人民币汇率、南海、互联网自由、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外向性进攻态势。如何解释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上述变化?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或战略究竟是内敛还是外扩?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和两场局部战争失利的美国外交政策为何依然强硬?针对这些疑问,目前国内学界比较普遍地运用“霸权未衰”论来解释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外交“低开高走”的态势。“霸权未衰”论认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金融危机并未严重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础,只要霸权犹存,美国外交依然有强硬的底气。但“霸权未衰”论难以解释美国急于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在北约轰炸利比亚问题上放弃军事指挥权等内敛现象,更不能预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趋势。本文尝试运用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周期视角考察奥巴马上台后的外交,希冀能更好地理解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未来走势。

* 刘建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武汉 430073)。

一、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

最早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演变的周期性规律进行系统考察的是美国学者弗兰克·克林伯格。克林伯格认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姿态呈现出‘内敛’期与‘外向’期的相互交替，亦即孤立主义撤出期和国际主义介入期的交替”。^①所谓“内敛”（introversion）是指一国不愿对他国积极施压（positive pressure），而“外向”（extroversion）则是一国愿意在边界之外对他国积极施加经济、外交和军事影响。^②

在克林伯格看来，自1776年美国立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内敛”期和“外向”期相当有规律地进行交替。一个完整的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由大约21年的内敛阶段和大约27年的外向阶段构成。^③按照克林伯格及其学生杰克·霍尔姆斯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美国外交政策迄今经历了四个半周期，即五个内敛期和四个外向期，当前正处于第五周期的外向期，每个内敛与外向期的起止年代和时长见表-1。

除克林伯格之外，其他美国学者也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作出了贡献。如迈克尔·罗斯金借用库恩范式理论系统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式转换规律。罗斯金认为，回答美国外交政策中“我们应该是在大洋这一边进行防御来保护我们的利益，还是跨过大洋积极进行海外干预来保护我们的利益？”这一古老的问题，可分为两种范式，赞成前者的是一种“非干涉主义”范式，赞成后者的则是一种“干涉主义”范式。^④他认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奉行“干涉主义”范式时期与“非干涉主义”范式时期大约每隔二十几年交替一次，如19世纪70、80年代是非干涉主义的“大陆范式”时期，接着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二十年的干涉主义的“帝国范式”时期，再接着是20世纪20、30年代非干涉主义的“凡尔赛范式”时期，然后是20世纪40至60年代干涉主义的“珍珠港范式”时期，随后则是20世纪70、80年代非干涉主义的“越南范式时期”。^⑤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何以出现“内敛—外向”或“非干涉主义—干涉主义”的周期性交替或转换，相关学者给出了如下种种解释：

① Frank L. Klingberg, *Positive Expectatio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Historical Cycles of Realistic Idealis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②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4, No. 2, 1952, p. 239.

③ *Ibid.*, p. 240.

④ Michael Roskin,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and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9, No. 3, 1974, p. 563.

⑤ *Ibid.*, p. 581.

表-1 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周期划分

	内敛时期	时长(年)	外向时期	时长(年)
第一周期	1776—1798	22	1798—1824	26
第二周期	1824—1844	20	1844—1871	27
第三周期	1871—1891	20	1891—1919	28
第四周期	1919—1940	21	1940—1967 ^①	27
第五周期	1967—1987/1988 [*]	20/21	1987/89—2014/2016? [*]	27?

资料来源: 克林伯格 1952、1970、1983、1990、1996 年的相关著述以及霍尔姆斯在 1985、2006、2007、2009、2010 年的分析。

* 表示克林伯格与霍尔姆斯在周期划分起始时间上的区别。克林伯格认为第五周期内敛期结束于 1987 年, 霍尔姆斯则认为终于 1988 年。克林伯格认为第五周期的外向期始于 1987 年, 终于 2014 年, 而霍尔姆斯则认为该外向期应始于 1989 年, 终于 2016 年。^②

1. 公众情绪变化。克林伯格认为美国国内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姿态。^③ 美国外交政策演变受美国公众“内敛”与“外向”两种情绪交替的驱动。^④ 诸如经济大萧条、珍珠港袭击等重大事件均能导致美国公众情绪转向内敛或外向。

2. 经济周期。布莱恩·波林斯和兰德尔·施韦勒两位学者建立了一种联结国际体系与国内层次的双层次分析框架, 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中出现的“内敛—

① 关于第四个外向期的结束年代, 克林伯格在其开创性研究 1952 年的论文中只给出了起始年代, 没给出结束年代。1983 年, 克林伯格在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美国外交政策从 1940 年开始的外向期转向新内敛期大约是在 1966 年或 1967 年。见 Frank L. Klingberg, *Cyclical Tren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ods: The Unfolding of America's World Rol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chapter 4。到上世纪 90 年代, 克林伯格最终将该外向期的结束年代确定为 1967 年。参见 Frank L. Klingberg, “Historical Periods, Trends, and Cyc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4, No. 4, 1970; Frank L. Klingberg, “Cyclical Trends in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in 1990”,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No. 15, Spring 1990, pp. 54-58; Frank L. Klingberg, *Positive Expectatio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Historical Cycles of Realistic Idealism*.

② Jack E. Holmes, *The Mood/Interest The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5; Jack E. Holmes and Kupt Pyle, “Path to Preeminence: A Long Cycle Analysis of U. S. Foreign Policy, 1871—1918”,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San Diego, March 22—25, 2006; Jack E. Holmes and Kupt Pyle, “How an Understanding of Mood/Interest Analysis Could Mitigate Some Problems in US Foreign Policy: A New Look at the Long-term”,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Chicago, IL, February 28—March 3, 2007; Jack E. Holmes and Gretchen Keillor, “Long-Term Foreign Policy and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How Much Choice, and How Much Necess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SA's 49th Annual Convention, March 26, 2008; Jack E. Holmes and Sara Aardema, “Long-Term Foreign Policy Mood and U. S. Involvement in System Wars: Is There a Way to Reduce the Odds?”,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ew York City, February 2009; Jack E. Holmes and Stewart Elzinga, “President Obama's First Year Foreign Policy and Long-Ter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ends: Some Tentative Thought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ew Orleans, February 2010.

③ 霍尔姆斯认为“公众情绪”与“公共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共舆论”对某个时期极化的议题或重大事件的反应要么迟缓、要么过激, 具有很明显的波动性和短期性, 因而不能反映公众的意愿。“公众情绪”则相对稳定, 能够反映一段时期(二三十年)内公众对外交政策方向的看法, 因而较公共舆论更能反映公众的意愿。参见 Jack E. Holmes and Stewart Elzinga, “President Obama's First Year Foreign Policy and Long-Ter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ends: Some Tentative Thoughts”, p. 11。

④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239.

外向”钟摆模式。具体来讲,就是将分析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与众多用来解释国家外交行为的“第二意象”视角联系起来。^①两位学者的考察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出现的“内敛—外向”摇摆与全球和美国经济的上升与下降周期相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内敛期恰恰处于世界和美国经济的下降时期(包括“衰退”、“萧条”两个阶段),而美国外交政策的外向期则处于世界及美国经济的上升时期(包括“复苏”、“繁荣”两个阶段)。此外,考察还表明全球经济状况和美国对外冲突行为之间亦存在周期性的同步关联:美国在内敛阶段介入军事争端的次数,较之以前或之后的外向阶段都少得可怜,并且在内敛时期冲突的持续时间要远远少于外向时期。^②

3. 行政 vs. 立法。罗斯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之所以出现范式转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如果国会接受总统的领导并且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美国就能进行积极的干预行动;当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厌倦干涉活动并且对强势总统的领导感到不满时,对外干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③通常而言,在干涉主义范式时期,国会赞成政府的外交政策行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对政府的行动给予资金支持,而在非干涉主义范式起作用时期,国会所起的作用刚好相反。“强势总统迟早会激起国会的反制,国会至上反过来也会引发总统权力的反弹。”^④行政、立法部门权力的此消彼长及它们对外交政策主导权的争夺,驱动美国外交政策在干涉主义范式与非干涉主义范式之间转换。霍尔姆斯也认为,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斗争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在外向时期,行政部门主导政策的制定,而在内敛时期,公众情绪通过国会和民意限制了政府的行动。”^⑤

4. 外部环境。克林伯格认为外部因素也是塑造美国国内情绪变化的一种重要力量,并进而促使美国外交政策转向。在他看来,欧洲战事、边界危机等因素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重要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外转通常发生于欧洲大国间出现高强度外交或彼此之间发生战争时期,如 1798—1823、1846—1871、1893—1919 和 1939—1945 年在欧洲发生的战事,都给美国外交转向外向期提供了契机。^⑥

5. 代际差异。罗斯金强调代际因素对“非干涉主义”与“干涉主义”范式转换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明显的政治代际。“与欧洲相比,美国国内的代际角色和代际差异更为重要”。他认可亨廷顿关于美国国内政治代际转换的观点,

① 作者列举的“第二意象”的国内视角主要有三种:1. 艰难时世促使领导人寻求海外冒险(转移注意力假设);2. 充裕资金和军力增长导致武装冲突(战争经费假设);3. 经济增长产生对外扩张的社会需要(侧向压力假设)。参见 Brian M. Pollins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Linking the Levels: The Long Wave and Shifts in U. S. Foreign Policy, 1790—199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3, No. 2, 1999, p. 432.

② *Ibid.*, p. 436.

③ Michael Roskin,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and Foreign Policy”, p. 582.

④ Geir Lundestad, “Uniqueness and Pendulum Swings in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3, 1986, p. 418.

⑤ Jack E. Holmes, *The Mood/Interest The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142-143.

⑥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64—266.

即“从周期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历史,在寿命上大约是一个代际。”^①在他看来,“干涉主义”与“非干涉主义”范式间的转换大约经历一个代际,亦即在执行一种外交政策范式产生灾难性后果后,与老一代精英相比,新一代精英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古老问题的回答持有不同的答案,两代之间的妥协变得不可能。随着老一代的退休和离世,他们所倡导的范式逐渐被新一代所支持的范式取代。因此,新范式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一代对老一代的胜利。^②

6. 挑战与应战。克林伯格强调挑战与应战在美国外交政策“内敛”与“外向”交替形成中的作用。他指出,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理念“在我们历史上至少遭受四次强有力的挑战,每一次我们都以双倍的反应来迎接挑战——首先是用‘内敛’的办法,接着是用‘外向’的办法。在每一个内敛—外向周期末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加强,接着又开始迎接新的挑战”。^③克林伯格指出了历史上美国自由、和平和繁荣遭遇的五种挑战: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暴政和欧洲干预,19世纪中期的奴隶制和经济萧条,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以及20世纪晚期与越南战争相关的社会动乱。这些挑战均始于每个内敛—外向活动周期阶段的开始时期(即内敛时期)。对这些挑战的解决则发生在活动周期的外向阶段:门罗主义、内战、一战、冷战缓和、苏联终结。^④

7. 社会变化及其限度。克林伯格认为社会是变化的,而社会变化是有限度和有规律的。他认同索罗金提出的“内在变化原则”,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变化是相当容易的,因此,社会中“富有创造力的少数”能够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赢得胜利并且推动政策的改变。然而社会变化是有限度的。社会变化存在限度的意义在于:当政策走向极端时,国家会相当危险,而民众通过直觉和推理认识到这一点,并促使政府及时调整政策。^⑤

8. 亚文化价值观冲突。盖尔·伦德斯塔德从美国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效应,他认为美国认同建立在相互冲突的亚文化价值观上,在一个时期内某一价值观被强调,而在另一个时期相反的价值观则占主导地位。^⑥在美国文化中长期存在道德准则与实用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权力与理想、变革与稳定等价值观念的冲突。美国外交政策在不同价值观念的主导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由此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呈现钟摆式的循环。

① S. P. Huntington, “Paradigms of American Politics: Beyond the One, the Two, and the Ma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9, No. 1, 1974, pp. 23—25.

② Michael Roskin,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Shifting Generational Paradigms and Foreign Policy”, p. 587.

③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269.

④ *Ibid.*, pp. 269—270.

⑤ *Ibid.*, p. 266.

⑥ Geir Lundestad, “Uniqueness and Pendulum Swings in US Foreign Policy”, p. 419.

9. 情绪与利益冲突。霍尔姆斯将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动力——自由主义情绪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现实的政治—军事利益联结起来,并且认为两者间存在冲突。他认为,“主导情绪会将国家推向一个极端,而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外部现实又会迫使主导情绪转向”。^① 国家利益与主导情绪间的张力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内敛与外向的周期性交替。

上述解释表明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内敛—外向”钟摆或周期性交替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既可以从美国国内公众情绪、社会变化、代际差异等方面来解释,也可以从外部环境因素来解释,还可以从政治上的行政—立法斗争、经济上的周期变化、文化上的亚价值观冲突等角度解释。由克林伯格等人创立的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虽然存在周期划分标准模糊、周期起始时间点难以确定以及由此导致的理论与现实不尽一致等缺陷,但它总体上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变迁中的内敛期与外向期交替演变的周期性规律,从而为我们考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所处的阶段性特征、未来走向及其动因,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

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所处的周期

从表1所显示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周期规律来看,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大体上处于第五周期的外向期,且处于该外向期的末段,这已在被奥巴马执政三年多来的外交政策实践所证实。

(一)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外交仍处于第五周期的外向期

从奥巴马执政三年多来的外交政策走势来看,面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导致美国软硬实力急剧下降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击,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一度采取守势。他下令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在开罗大学对伊斯兰世界发表友善的讲话,在访问中国时不提人权问题,愿意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等等。然而,在经过短暂一年的收敛后,自2010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外向性进取态势。在2010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对美国霸权实力、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价值观表示自信,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最强大的军队、强大的联盟、充满活力的文化魅力以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领导世界的历史经历”,且“仍然保持了过去数十年内使我们能够领导世界的实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反恐战争、新兴“影响力中心”的崛起、灾难性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下降和安全威胁增多。“9.11”事件后,美国的军队、资源和国家安全战略都聚焦于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危险以及冷战和平结束后日益增多的各种冲突”上。而与此同时,中、印、俄等新兴国家“凭借不断增长的经济与稳定的政治日益显示出强

^① Jack E. Holmes, *The Mood/Interest The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75.

大的全球与地区影响力”。^① 奥巴马政府“不接受美国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提出了“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奥巴马政府拒斥孤立主义,寻求“全面接触”或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其外交呈现出外向性进取姿态。

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增加对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创造就业和增强美国竞争力,以“重振美国力量的基础”。在贸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在轮胎特保案、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并大力推动“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以主导亚太经济合作进程。在金融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利用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实现刺激国内经济、稀释美国债务、向外转嫁通胀等多重目的。

在防务领域,奥巴马虽然倡议“无核世界”,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美国不但不放弃核武,而且还通过多次临界地下核试验以保持美国的核优势。虽然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控制国债规模的压力,但美国国会并不打算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只是削减一些军事训练和行动方面的开支。^② 美国将继续在激光武器、多功能天地飞行器、全球远程轰炸机、网络战等方面投入大量研发经费,继续保持对其他大国的领先优势。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虽然总体上在中东和中亚收缩兵力,但并不等于要放松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美军仍然在沙特、巴林等地保留驻军和军事基地。在非洲和中东,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南苏丹独立。2011年初北非多国政局动荡都隐现美国的战略“黑手”。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保护平民安全为由,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随后美国与其北约盟友滥用联合国的授权对利比亚政府军狂轰滥炸,得手后更竭力将干预利比亚模式复制到叙利亚,并企图通过增加制裁和战争威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在东亚,美国决心维持其对远东太平洋自二战以来的传统控制,加快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在“重返东亚”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加强在关岛的军力部署,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借“天安号”事件、延坪岛事件强化日、韩同盟,不顾中方反对悍然将航母开进黄海进行军演,在钓鱼岛事件中明确表示美日同盟适用于钓鱼岛。美还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利用印度对中国的不信任来制衡中国。奥巴马还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宣布驻军澳大利亚,并派希拉里出访大选后的缅甸,意欲削弱中国对缅甸的传统影响力。

在人权、民主领域,美国借谷歌事件和“阿拉伯之春”力促“全球互联网自由”,在全球展开价值观攻势,借“促进网络自由”为由,将北非、中东地缘战略变局引向政治社会变革,矛头直指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民主化战略对象。^③

①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The White House,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② Craig Whitlock, “Gates Says Pentagon Faces Spending ‘Crisis’, Blames Congress for Potential Cut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11.

③ 袁鹏《中东变局、美国应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20页。

在遭受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重创后,奥巴马上台后的美国为何依然强硬,在外交上仍然呈现外向姿态?对此,首先,从美国外交政策内敛与外向的基础来看,金融危机虽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但美国仍然占据全球 GDP 份额的 22%,刚上升为世界第二的中国 GDP 约为 5.824 万亿美元,而美国为 14.66 万亿美元,约为中国 GDP 总额的三倍。^①领先的经济实力加上科技创新优势和超强的军事实力,奠定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外交仍显强硬、外向的底气。

其次,从美国外交政策内敛与外向的时段来看,无论是在外向期还是内敛期,一般都会经历三个阶段,即首段、中段和末段。如美国外交 1940—1967 年的外向期可分为首段 1940—1949 年,主要事件有美国参加二战、“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中段为 1949—1957 年,主要事件有朝鲜战争、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向英法施压、积极应对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末段是 1958—1967 年,主要事件有“猪湾事件”、东京湾决议和越南战争升级。^②同样,自苏东剧变以来开始的美国外交政策第五个外向期的首段是 1989—1999 年,主要事件有海湾战争、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中段是小布什执政的 2000—2008 年,主要事件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末段则从 2009 年奥巴马入主白宫开始,到克林伯格、霍尔姆斯预测的 2014 年或 2016 年结束,已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美国推动对伊朗制裁、“重返东亚”等。此外,表 1 显示,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外向期平均时长为 27 年,而从老布什上台后开始的第五个外向期到现在差不多是 23 年,因此,奥巴马上台以来的美国外交仍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五个外向期。

再次,美国外交政策的惯性意味着后任总统调整前任总统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虽然很想与小布什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外交政策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很难一下子彻底决裂。“希望美国外交中新保守主义一章在奥巴马执政时结束是不现实的”。^③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奥巴马总统会抛弃新保守主义的议程,但新保守主义关于美国作为一个道义大国的观念深深植根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在国内与社会保守主义传统表达密切关联,从而使新保守主义理念能够在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持续获得反响。^④在新保守主义的“美国首要”、“国际主义”、“促进民主”、“尚武”和“单边主义”五大要素中,^⑤被奥巴马政府明确摒弃的只有“单边主义”和“尚武”,其他要素在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

① Wayn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Conditions”, June 24, 2011,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3534.pdf>.

② Jack E. Holmes and Stewart Elzinga, “President Obama’s First Year Foreign Policy and Long-Ter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ends: Some Tentative Thoughts”, p. 16.

③ Homolar-Riechmann, Alexandra, “The Moral Purpose of US Power: Neoconservatism in the Age of Obama”,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5, Issue 2, June 2009, p. 179.

④ *Ibid.*, pp. 179—196.

⑤ Justin Vaisse, “Why Neoconservatism Still Matters”, *Foreign Paper*, No. 20, 2010, <http://www.brookings>.

如在 2010 年 1 月 19 日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称美国绝不作老二,^①明确表示要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首要地位。

最后,从美国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竞争来看,共和党向来指责民主党在外交、安全上表现软弱,这给来自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施加了压力,不利于民主党竞选。为了避免、回应共和党的指责,通过在外交上展示强硬和政绩,奥巴马政府以此显示外交、安全领域不仅不是民主党的“短板”或弱项,甚至民主党比共和党干得更为出色。

(二) 奥巴马政府外交面临较大的内敛压力

虽然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外向进取性,但也面临较大的内敛或收缩压力。从奥巴马上台以来的外交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在实行有选择的战略收缩”,^②或者说其全球战略调整是“宏观收缩,局部扩张”。^③

面对债务天花板的压力,美国不得不减少海外干预,其中东的战略收缩不可逆转。在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后,奥巴马政府正实施阿富汗撤军计划,不管 2012 年总统选举奥巴马是否连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已成定局。在北非,美国虽然参与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但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不满奥巴马未经国会授权擅自对利比亚动武。奥巴马也不愿美军过度介入,宁愿将北约此次行动的指挥权交给英法,以免重蹈在阿富汗的覆辙。在东亚,虽然美国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但其对华战略基调不是为了阻止中国崛起,而是为了防范中国崛起对其在东亚和西太平洋霸权的挑战。因自身实力有限和分散,美国更多的是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通过强化与日、韩、澳同盟合作和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伙伴国来防堵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并不想与中国为敌,也不希望采取过激行动导致两国关系破裂。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一方面通过发表南中国海关切美国国家利益的声明,并与越、菲进行联合军演来牵制中国,一方面也通过开展两军交流以避免同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直接碰撞。所有这些均表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已显露出收缩之势,差不多从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美国外交第五轮外向性扩张,到奥巴马执政时渐成强弩之末,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外交将面临更大的收缩压力,这一趋势不仅可从前四个周期的时间规律推出,而且还有如下几点原因:

1. 从经济周期上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由美国主导的、以“信息技术”大规模应用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新一轮经济繁荣周期渐告结束,见表-2。

根据布莱恩·波林斯和兰德尔·施韦勒的研究结论推测,自苏东解体开始的美国外交政策第五个外向期将随着这波经济繁荣的结束而落幕。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随着世界及美国经济进入第五波衰退和萧条期,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第五个内敛期将接踵而至。这一趋势也与下列预测基本相符。据《经济学家》预测,在世界

①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② 陶文钊《奥巴马的外交“新政”与战略调整》,《国际观察》2010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③ 于洪君《关于国际八大趋势发展演变的辩证思考》,《当代世界》2012 年第 1 期,第 4 页。

表-2 五轮经济长波及不同阶段经历的时间

长波(主导的技术创新)	繁荣	衰退	萧条	回升
第一波(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	1782—1802 年 (20 年)	1815 ~ 1825 年 (10 年) (战争 1802—1815)	1825—1836 年 (11 年)	1836—1845 年 (9 年)
第二波(钢铁和铁路技术)	1845—1866 年 (21 年)	1866—1873 年 (7 年)	1873—1883 年 (10 年)	1883—1892 年 (9 年)
第三波(电气和重化工业)	1892—1913 年 (21 年)	1920—1929 年 (9 年) (战争 1913—1920)	1929—1937 年 (8 年)	1937—1948 年 (11 年)
第四波(汽车和电子计算机)	1948—1966 年 (18 年)	1966—1973 年 (7 年)	1973—1982 年 (9 年)	1982—1991 年 (9 年)
第五波(信息技术)	1991—2011 年	2011—?	?	?

资料来源: 陈漓高、齐俊妍《信息技术的外溢与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陈漓高、齐俊妍借鉴了雅各布·范杜因《创新随时间的波动》的成果,但 1973 年以后的数据是其根据所搜集的资料接续的。

下一个 10 万亿美元 GDP 总产出中,中、美、俄、巴(西)、日、印(度)将依次贡献 1.65、1.43、0.7、0.46、0.42、0.38 万亿美元。^① 该预测表明美国经济占世界 GDP 的份额越来越小,“金砖国家”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大。“世界展望”将 2016 年定为“中国元年”,因为中国将在这一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强国。中国经济总量(按 PPP 计算)将从 2011 年的 11.2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9 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经济增长总量仅从 15.2 万亿美元增加到 18.8 万亿美元。^② 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在 2010—2030 年间将以年均 2.7% 的速度增长,在二十国集团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将从目前的大约三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③ 虽然这些都只是预测,但这些预测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作为美国霸权基础的经济实力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的周期性下降将成为制约美国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从外部环境对美国的制约来看,对外战争的失利、“他者的崛起”、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强权政治引发的反弹等因素均冲击美国霸权,迫使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苏联解体后,失去了战略对手的美国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他大国由于与美实力悬殊,不能对其形成强有力的制衡。但是,美国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在相当程度上损耗了美国的国力。“有学者已把这两场战争对美国未来命运的影响同英帝国的布尔战争(1899—1902 年)相提并论,认为美国霸权由此走到了转折性关头。”^④ 进入新世纪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也加速了这一进程。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大国快速发展,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对美国的制衡能

① “Where Will the Next \$10 Trillion of GDP Come from?” *The Economist*, May 25, 2011.

② Peter Shadbolt, “Will the ‘Age of America’ End in 2016?” April 26,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BUSINESS/04/26/us.china.economy/index.html>.

③ “A Bleak Look at America’s Futur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2011.

④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7, Issue 3, 2008.

力逐步上升。此外,美国的霸道做派及强权政治也招致他国的反弹。例如巴基斯坦对北约轰炸巴检查站的强硬反击不利于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硬顶”,使美欧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干预模式的企图难以得逞;中俄除联手否决美欧推动的打压巴沙尔政权的议案外,还反对美国对伊朗进一步制裁,从而使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志。

3. 从美国公众的情绪来看,美国历史上经济危机爆发、对外战争失利,往往导致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将主要资源和精力用来处理国内问题,反对政府从事积极的海外干预,从而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转向内敛或内敛程度加深。如 1873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外交政策转向内敛,1929 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则加深了自 1919 年开始的内敛程度。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争的失利激发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也直接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进入第四个内敛期。同样,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国劳民伤财,金融危机爆发又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整个美国人心思变,国内要求更加关注国内事务的社会思潮日趋壮大。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未能形成气候的国内孤立主义则在此背景下得以复兴。美国国内以“反对美国干涉或参与无关自己核心利益的国际事务”^①为核心的形形色色的孤立主义情绪重新抬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达到了 40 年来的最高峰,49%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美国应该首先管好自已的事情”。^② 孤立主义情绪升温成为影响美国外交内敛性收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从行政与立法关系来看,在 2010 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由民主党掌控两院多数席位的国会尚能响应总统的倡议,促成国会通过经济刺激法、增兵阿富汗法、医改法案等。然而,中期选举后掌控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在 2011 年国会复会之后就提出要废除医改法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国会一直质疑奥巴马政府未经国会授权就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以伯纳为首的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推动切断利比亚行动军费的议案,虽未获通过,但却成功否决了一项国会授权政府开展对利军事行动(禁止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的议案。虽然白宫和国会在宣战权问题上暂时“打成平手”,但这表明在野的共和党在对利比亚动武一事上不会轻易放过奥巴马总统。^③ 2011 年夏季上演的债务危机“给美国政治文化带来的警醒是——妥协已死,奥巴马的对手现在唯一感兴趣的的就是羞辱他。债务上限危机表明我们体系内存在严重的功能失调问题”。^④ 随着 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一心想让奥巴马下台的共和党人不希望看到奥巴马在外交上有更多成就,他们不仅不支持、配合总统的政策议程,而且可能利用各种机会让奥巴马难堪。共和党人的消极态度或阻碍行为将使奥巴马很难采取大有作为的进取性外交。

① 石斌《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 年第 1 期,第 59 页。

② 《美国人感叹美中地位此消彼长》,《参考消息》2009 年 12 月 5 日。

③ 笑天《美众议院拒绝授权政府对利动武》,《参考消息》2011 年 6 月 26 日。

④ 雅各布·韦斯伯格《美国选择自我毁灭》,《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1 年 8 月 11 日, <http://www.ftchinese.com/m/email/weekly.html>。

上述制约因素虽然没能抑制奥巴马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姿态,否定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外向性主调,但确实减少了其锋芒,使奥巴马政府不能像小布什政府那样,推行赤裸裸的进攻性扩张政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约因素将逐渐发酵,最终促使美国未来一段时期外交政策基调转为内敛。因此,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虽然主调是外向性的,但趋势是走向内敛。虽然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等事务上采取了一些外向性进取政策,但外向并不等于扩张,进取并非就是进攻。从某种程度上看,在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外交举措中,有的是被动反应而非主动塑造,如对北非、中东大变局的反应,有的是欲抑先扬,如增兵阿富汗是为了寻求体面的撤军,有的则带有补课色彩,如重返东南亚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小布什时期忽视东南亚的矫正,有的是以防堵为主,如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更多地是为了防堵中国海权的拓展影响美国对西太平洋的霸权控制,也是美国对其盟友履行安全保护承诺、维护其霸主威望或信誉的战略之举。因此,与小布什外交政策相比,奥巴马外交政策虽然总体上外向,但明显缺少小布什外交政策的主动塑造和单边进攻的锋芒。

三、处于第五外向期末段的美国外交政策特点

处于第五外向期末段的奥巴马外交政策具有如下特征:

1. 对外扩张的国内动力不足。债务天花板、派系纷争^①、政治极化^②、民意不满等制约了美国对外的积极干预。居高不下、不断攀升的债务是当下美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也直接影响美国霸权赖以维持的庞大军费开支。当有人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海军上将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时,马伦回答道,“是联邦赤字。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如果它想继续有保持超群的军事实力,就必须修复本国的财政状况”。^③ 围绕是否增加政府投资、提高债务上限、削减军费开支等问题,美国两党矛盾尖锐、互不相让。奥巴马在2011年初提出的增加政府投资的建议,偏离了共和党人要求减税以削减飙升的财政赤字的方向,也背离了共和

① 在这次债务危机中,美国国会两党内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如坚决反对增税和主张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的“众议院茶党连线”,主张有限政府和强大国防的“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张两党妥协的“星期二团体”,主张减少赤字和提高债务上限的“蓝狗民主党”,反对任何削减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开支的“国会进步连线”,以及由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德米特领导的在参议院反对提高债务上限的“参议院保守派基金”。参见“US Debt Crisis: Political Factions That Will Influence the Deal”, *The Telegraph*, July 29, 2011。

② 美国人比尔·毕晓普在其《大归类》(*The Big Sort*)一书中描述了美国人政治观点正逐渐向类似区域“集中”。因此,尽管2006年仅有19个州出现了选票“一面倒”的情况(其中既有倒向共和党的,也有倒向民主党的),但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36。在地方层面上,这种情况甚至更加极端。美国前白宫预算主任彼得·欧尔萨格最近写道:“我们的政治体系两极分化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难以推进任何立法。”欧尔萨格与其他一些人预测,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僵局。不管有没有那些数万亿美元的“交易”,争吵显然都不会停止。参见吉莲·邵蒂《美国两极化堪忧》,《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8月12日, <http://www.ftchinese.com/m/email/weekly.html>。

③ 菲利普·斯蒂芬斯《美欧债务危机预示着什么?》,《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8月11日, <http://www.ftchinese.com/m/email/weekly.html>。

党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路线。近年来两党围绕债务问题互不买账,一度导致政策僵局。“美国面临的是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以及持续的政治瘫痪。战略决策被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挟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最后一刻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违约。但一块‘胶布’不会弥合两党在税收和支出方面‘针尖对麦芒’般的分歧——这种分歧让赤字越积越多。”^①不仅两党之间存在分歧,就连两党内部也有分歧。在 2011 年度军费预算问题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审查国防部提出的军事预算时,传统的共和党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增加军费开支,而由茶党支持的共和党年轻议员则认为,居高不下的赤字威胁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因而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然而,即使是茶党议员内部也存在分歧。他们在保留或获得选区军事合同项目与减少政府预算的党的路线之间面临两难选择。^②华盛顿的党派斗争也导致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治体制运作方式及政客的不满。据《华盛顿邮报》2011 年 8 月 9 日的民调显示,近 80% 的受访者不满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这与 2009 年相比急剧上升。多数美国人认为,恰恰是华盛顿的两党政客该为当下经济危机负责。接近 3/4 的受访者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修补美国经济,与去年 10 月份相比,“无信心”投票增加了 21 个百分点。另外,接近 80% 的人表示“极为不满”。^③经济萎靡不振、国债居高难减、在阿富汗的战争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这些挑战侵蚀了未来几年美国实施外向性政策的能力和民意基础。

2. 要求盟友、伙伴更多地分担责任,强调选择性介入。在超强实力因经济危机、对外战争挫折遭到削弱时,美国往往倾向于在战略收缩时让盟友或他国分担更多责任。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在遭受经济危机和越战挫折后的全球战略收缩。尼克松强调“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要求“美国承担的义务同它自身的利益以及它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相适应”。^④它表明在一个新的“多中心世界”里,虽然美国仍将肩负大部分的重担和责任,但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分担责任。奥巴马外交政策差不多与尼克松如出一辙。面临拖延日久、耗资巨大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泥潭及金融危机的冲击,在 2008 年选举时奥巴马就承诺,为应对共同威胁和增加共同安全,他将重建必要的联盟、伙伴关系及其机制,^⑤亦即通过回归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路线”(多边主义),让其盟友、伙伴更多地分担责任。2012 年 1 月奥巴马政府推出新军事战略,计划在今后十年内削减 487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对此,美国防部长帕内塔率直地说:

① 菲利普·斯蒂芬斯《美欧债务危机预示着什么?》。

② “A Strikingly Unaudacious Speech from Barack Obama Failed to Address America’s Problems”, *Economist*, January 27, 2011.

③ DemFrom CT, “Washington Post Poll: Public Says a Pox on Politics”, *Daily Kos*, August 11 2011,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1/08/11/1005357/-Washington-Post-poll-Public-says-a-pox-nbsp-on-nbsp-politics>.

④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608—609 页。

⑤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财政危机迫使我们面对现在的战略转变”，美国军队将“瘦身”，美国在全球承担的义务要收缩，盟国和重要的伙伴必须做得更多。^①

此外，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利比亚战争、突袭本·拉登和索马里海盗的经验，美国债务高企导致军费削减等因素，促使奥巴马政府积极调整美国海外干预或介入模式，通过战场撤军、裁减陆军、前沿驻军后缩、分散海军陆战队部署等措施，使美军的海外干预更加灵活、机动，充分发挥情报收集、无人机突袭对目标对象的定点清除作用，将美国干预目标重点转向只负责变更目标国政权、不负责重建目标国的“只打不建”干预模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正在寻求一种灵活、高效、低成本的选择性介入模式。

3. 收缩时注重威望。作为霸权国家，美国从海外收缩时特别注重保持自己在盟国及国际社会中的威望。美国威望政策的主要手段包括承诺遵守条约义务、派航母到危机或争端地区耀武扬威、从海外撤军时强调保持体面等等。例如，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从越南脱身是对美国“意志”和“信誉”的严重考验。若美国简单地从越南“一走了之”，那将意味着“放弃南越”、“承认失败”或被看做是“投降”。为了实现体面的撤军，美国一方面通过打开对华关系大门和对苏缓和，向越南施加政治压力，一方面则加大了对越南北方的军事压力。例如，从1972年5月9日到10月23日，美国共向越南北方发动了41500架次的空袭。这表明尼克松政府在实施“越南化”计划的同时，始终不放弃施加军事压力和使战争升级的政策。^② 同样，奥巴马不接受美国从阿富汗简单撤军的方案。因为若简单撤军，则意味着美国之前在阿富汗的努力付诸东流，不仅危害美国在中亚的地缘安全利益，而且还大大折损美国的信誉或威望。为此，奥巴马采取了“欲撤军先增兵”的政策，通过增加兵力和加大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来实现体面的撤军。同样，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不能容忍北约近半年通过轰炸迫使卡扎菲下台的努力半途而废。在北约骑虎难下之际，美国选择在外交上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唯一合法代表，意在给其北约盟友和利比亚反对派打气，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威望。尽管美国把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北约，但美国毕竟是北约中最重要的国家，如果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失利，不仅美国与其欧洲盟国的关系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国在北非、中东促进民主的努力将会遭受挫折，而且美国面子上也过不去。

4. 在与主要竞争对手合作时强调“软遏制”。美国在内敛或收缩时，一方面与主要竞争对手合作（或缓和），一方面特别注重利用对手的弱点实施软遏制。例如尼克松一方面与苏联搞“缓和”，另一方面深知苏联的弱点在于其周边地区地缘环境的不稳定，充分利用这一点来牵制苏联。比如，美国通过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使波兰的局势发生动荡，让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受到考验。特别是尼克松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

① 陶文钊《如何看待美国的实力地位》，《当代世界》2012年第1期，第37页。

②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第617页。

门,从而在对苏关系中开始掌握一张新的王牌。^① 同样,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美国战略界精英越来越视中国为其主要竞争对手。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愿与中国合作,利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拉动美国经济的恢复,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以避免擦枪走火,在气候、能源等领域展开合作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另一方面,在美国自身实力遭受挫折的情形下,奥巴马政府充分利用中国自身的弱点尤其是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的特点来制衡中国。从 2010 年至今,奥巴马政府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或恐惧心理,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拉拢与中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共同遏制中国,通过这种软遏制手段来给中国制造麻烦,借以维护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控制。

结 语

全球化的深入、国际体系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增加、频发的重大突发性事件等因素可能导致美国应对外来威胁、谋求国家利益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外交政策调整的节奏加快,进而使美国外交政策演变的周期时长缩短,甚至内敛期与外向期的界限渐趋模糊,但是,有规律的周期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美国外交政策也不例外。^② 美国外交政策在“内敛”与“外向”之间钟摆式运行或周期性变动,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演变的显著特征。尽管存在缺陷,但克林伯格等人创立和发展的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理论,既为我们把握美国外交内敛与扩张的演变规律,又为我们考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及未来走势,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从美国外交政策史演变的周期来看,奥巴马执政以来的外交政策大体上处于美国外交史上第五周期的外向期末段,这已经或正在被奥巴马入主白宫三年以来的外交政策实践所证实。处于第五外向期末段,意味着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美国外向性扩张已成强弩之末,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将面临较大的内敛性调整压力,呈现出对外扩张时国内动力不足、海外收缩时注重霸权威望、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分担责任、对主要竞争对手既讲合作又强调软遏制等特征。而把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规律,认清当前奥巴马外交政策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吴文成)

①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第 650 页。

②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61-263.